

異議的意義 ——論東亞的反理學思潮⁺

楊儒賓^{*}

近代東亞如有共享的思想因素的話，儒學當是其中主要的一種因素，而眾所共知，此時期的儒學義理之內涵，主要指的是一種講究天道性命貫通的新儒學，傳統上稱之為理學或道學。理學如再細分，其內容大抵可分屬朱子學與王學兩系。東亞三國皆有朱子學與王學的傳承，但比重不同。大抵朱子學在三國皆享有官學的地位，居體制的優勢地位。王學在體制上則大半是在野的學問，但王學在中日兩國皆有過精彩的表現，在李氏朝鮮則只能居於潛流，抗衡朱子學的功能不顯。

理學可作為近代東亞的代表性思潮，這樣的地位是很難撼搖的。但儒學畢竟是個複雜而多元的價值體系，在儒學的共名下存在著各種異質的分流。這些分流代表的異議之聲此起彼

落，就發生的歷史機緣考量，可謂鮮少共謀，但全程以觀，卻隱約有些共識，因此不妨視為具有共同核心理念的一種思潮，筆者稱之為反理學的思潮。反理學的思潮基本上以朱子學作為理論爭辯對象，但與東亞另一股重要的陽明學思潮也吵雜不同調。這股反理學的思潮之內容、範圍、名稱，目前學界並沒有共識，但大體上其範圍籠蓋日本的古學、韓國的實學以及中國學界所說的氣學。本文所說的反理學思潮即建立在這股思潮上的一種理想類型的設計，此思潮乃對應著朱子學而生，代表此思潮的思想家所提的論點可視為朱子學的對蹠命題。

朱子學與作為朱子學的對反者之東亞反理學思潮，兩者在歷史上的傳承的途徑卻極不一

⁺ 本文係二〇一〇年九月十日由本院與日本關西大學文學部、臺灣朱子學研究協會共同主辦之「朱子學と近世・近代の東アジア」學術研討會中所發表之論文摘要。

^{*} 清華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

樣。朱子學的傳播途徑、師承關係通常較清楚，而且其學說在東亞各國都獲得體制的支持，勢力沛然莫之能禦。反理學的思潮不然，一方面它不像理學的思潮那般洶湧澎湃，在韓國，它呈現的模式甚至像點狀，而非以線狀或面狀的模式呈現。一方面，東亞這些反理學的儒者之學術傳承很不清楚，他們的論點似乎獨立迸發出來的，不容易看到彼此呼應的歷史影響之軌跡。但筆者所以會以「思潮」稱呼這些獨立發展出來的思想，乃因這些影響關係模糊難認的異國儒者，居然不約而同，提出了類似的命題（見下文），這樣的平行現象很值得留意。筆者認為：這樣的平行現象顯示反理學思潮本身的理論架構有種「必然性」，這樣的必然性當然不是先驗的用法，而是指它們具有相似的問題意識以及共通的理論資源，這樣的共同前提乃導引出類似的結論來。反理學的思潮在東亞各國先後發生，竟能殊途同歸，此一現象也顯示了反理學思潮的必然性可能有更深的源頭，這個源頭不是依文獻學或歷史學的進路可以澄清的，它有另外的理據。

簡單的說，反理學的思潮是理學思想的反命題，這樣的反命題對理學核心概念的「天道性命說」有種極不一樣的解釋。反理學思潮大概有如下的共同主張：（一）人的本質是自然氣化的，它是強度的、差異化的，沒有超越的心體、性體。（二）人的修養當是發展人的本質之性，此中包含知識與個性；而不是逆覺的返回超越的本性，也就是不再以「復性」說為然。（三）它們也主張：所謂的天道就是自然運作的氣化之總稱，沒有自然的氣化以外的超越存有。所以人與天的合理關係，乃是依自然律行事的天人合一，沒有悟道式的超越體證這回事。（四）它們大體也同意：真正的道德是要在人倫關係中產生的，道德即倫理，心性本身無道德可言。反理學思潮雖沒有嚴格的學派可言，可是我們可以看出它們的反是徹底的，

或是所謂的「基進的」，因為它在根源意義上作了形上學的批判，也作了主體的批判。

筆者相信以「相偶性儒學」為代表的反理學思潮到底也是儒學傳統中的一股支流，它和其他的儒學流派共同分享了儒家的基本價值：人的道德是要在倫理關係與文化傳統中才能顯現的，而每個人都有道德感，也有分辨善惡的能力。不但如此，即使在更哲學的層次上，反理學思潮與理學也同樣分享了氣化的世界觀，這樣的世界觀既表現在氣化的宇宙論上，也表現在形氣神的身體觀上。兩者最重要的差別，乃就存有的位階講，理學的氣化世界觀總要依本體而成立，就宇宙論而言，陰陽五行在實際存在上雖總與「無極而太極」同在，但就存有的秩序而言，太極優先於陰陽氣化。落在人性論上，心統性情，性（理）有存有意義上的優位性。

由於理學與反理學同樣具足了氣化世界觀，因此，當我們看出兩者的差異相時，也不宜忘掉兩者之間共享的成分。由於同樣具備氣化的理論，所以我們看到兩者的自然觀同樣強調陰陽氣化、萬物交感的作用；在人性論上，同樣強調沒有原子論式的個體，每個人心氣都是流動於人倫之間，也流動於人與自然之間，內外不斷交融，所有的主體性都是人倫性的，也是自然性的。簡言之，反理學思潮雖然對理學作了主體性與天道論的批判，但其轉化的架構依然有沿襲傳統的世界觀的一面。

當我們看出理學與反理學在斷裂中連續的結構，我們也可看出它與氣化世界觀告退以後的主流近代中國世界觀之歧異。關於近代中國思想的模態，林毓生先生有全盤崩盤之說，而全盤崩盤之重要因素在於「有機體思維的世界觀」所導致。林先生的說法不但在近代中國的大知識分子身上，我們可看到這樣的傾向。在近代文人身上，我們更可看到徹底的瓦解之意

象。郭沫若的〈天狗〉即是顯例。即使連浪漫多情如徐志摩，都有打破一切形式之呼喊。

這種全盤瓦解的現象背後，筆者認為「氣化世界觀」的消失是其因，也是其果。在氣化的世界觀下，人與人、人與自然、身與心之間，必然會有本質的繫聯。但在徹底俗世化的現代世界，權力義務的關係是建立在個體上的，一種原子論式的個體構成當今社會秩序與政治秩序的基礎。就這種觀點來看，反理學思潮雖被視為「告別中世紀、走向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因子，但它和理學之間，其實仍是形影不離，反而在當代思潮的衝擊下，兩者難兄難弟，同蒙艱困。如果當代也要走出，筆者猜想：也許這對難兄難弟還會有合作的一日，因為它們的象徵系統相同，理論旨趣也有相互支援之處。個中問題甚繁雜，容後再述。

